



光明学术探索文丛
GUANGMING XUESHU TANSUO WENCONG

文化与教育

教育理念的文化哲学沉思

冯青来 著

C

ulture and Education

Some Meditations to
Educational Ideas from
Cultural Philosoph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学术探索文丛
GUANGMING XUESHU TANSUO WENCONG

文化与教育

教育理念的文化哲学沉思

冯青来 著

Culture and Education

Some Meditations to
Educational Ideas from
Cultural Philosoph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教育:教育理念的文化哲学沉思/冯青来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5

(光明学术探索文丛.第1辑)

ISBN 978-7-80206-828-5

I. 文… II. 冯… III. 教育理论—文化哲学—研究 IV. G40.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9878号

文化与教育——教育理念的文化哲学沉思

作 者: 冯青来 著

责任编辑: 刘 彬

责任校对: 刘光普 叶衍瑛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1(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 订: 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总字数: 3000千字

总印张: 80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828-5

总定价: 300.00元(全10册)



作者简介:

冯青来，江苏南京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英语教育专业硕士，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为教育哲学、教育基本理论、英语课程教学论，研究兴趣涉猎文化哲学、伦理学等。1988年开始从事教书育人之业，在不同级别或类型学校执教20余年。对教育一往情深，对学术一片真诚，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关注教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或社会现象中的教育活动，相信人性善端的真实存在并感动于教育中人的真、善、美；坚守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信念和权利去诠释并追寻自己理想的教育。曾参与主持多项国家或省级有关课题及项目的调研，并在《全球教育展望》、《外国教育研究》、《外语电化教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与理性主义哲学相对的哲学分支，其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并行的研究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之中正蔚然成风。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倾向于用文化因素解释现代化及社会诸层面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文化的深层影响在我国当前社会现代化转型及教育改革发展中并未得到合理的解读。由此，本书立足于我国当前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通过对教育理念的文化哲学沉思，尝试在我国当前文化语境中建构合现实的教育理念，以导引当前教育实践对文化嬗变的合理应对，从而皈依教育给予人的本真价值——个性自由的理性人，进而实现教育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优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达成和谐发展的现代社会。



CONTENTS

目 录

导 论 / 1

- 一、研究背景:从现代性文化困惑到教育的悖论 / 1
- 二、题解:概念的简要界说 / 15
- 三、研究缘起 / 22
- 四、研究方法及篇章结构 / 25

第一章 文化·人·教育关系的理论根基 / 32

一、文化与人 / 32

- (一)文化人类学之人:人类文化的产物 / 33
- (二)文化哲学中之人:符号文化的动物 / 37
- (三)文化社会学之人:社会文化的本质 / 41

二、教育与人 / 44

- (一)我国的教育智慧 / 45
- (二)西方的教育精髓 / 48

三、文化·人·教育的关系解读 / 51

四、文化与教育的相关研究述评 / 55

- (一)国外研究的成果及影响 / 56
- (二)国内研究的现状及缺憾 / 65
- (三)本书的切入点:文化嬗变与教育应变 / 75



第二章 文化嬗变与教育应变的历史钩沉 / 78

一、我国的历程 / 79

- (一) 从先秦时期穿越汉唐盛世到鸦片战争 / 79
- (二) 从鸦片战争历经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 / 87
- (三) 从全国解放遭遇文革运动到科教兴国 / 91

二、西方的轨迹 / 99

- (一) 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 / 100
- (二) 从启蒙主义思想到功能主义教育论 / 113
- (三) 从“新教育”思想到人本主义思潮 / 129

三、中西方的比照反思 / 139

- (一) 对中西方文化的反思 / 139
- (二) 对中西方教育的反思 / 142
- (三) 教育中人自身的反思 / 147

第三章 当前文化嬗变及其教育理念诉求 / 151

一、当前文化与传统型文化 / 152

- (一) 传统文化的不合时宜 / 153
- (二) 当前文化的认同危机 / 158

二、当前文化与现代性文化 / 163

- (一) 现代文化的理性是非 / 163
- (二) 当前文化的理性缺位 / 168



三、当前文化的后现代疑惑	/ 174
四、当前文化下的教育理念	/ 176
第四章 理念及教育理念的语义哲学辨析	/ 179
一、理念的语言类型	/ 180
二、教育理念的辨析	/ 185
(一)教育价值理念	/ 188
(二)教育目的理念	/ 192
(三)人的发展理念	/ 197
第五章 教育价值理念的文化哲学剖析	/ 204
一、教育价值理念的文化迷失	/ 204
(一)文化意识:价值意识之母体	/ 205
(二)文化迷失:教育价值之迷离	/ 209
二、教育价值理念的文化逻辑	/ 217
(一)自我文化的扬弃	/ 217
(二)外来文化的审度	/ 229
第六章 教育目的理念的文化哲学追寻	/ 236
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纷争	/ 236
(一)两种目的观的文化批判	/ 237
(二)当前目的观的文化失落	/ 242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对峙	/ 248
(一) 对峙源于两种文化的分裂	/ 248
(二) 当前科学人文教育的分离	/ 256
三、心智自由:教育目的之诉求	/ 264
(一) 自由理念:概念之辨析	/ 265
(二) 智的开启:自由之可能	/ 275
(三) 心的解放:自由之意旨	/ 286

第七章 人的发展理念的文化哲学皈依 / 297

一、人的发展理念之文化迷途	/ 298
(一) 科尔伯格的发展论点	/ 298
(二) 人的发展现状之一:知识掌握的单一向度	/ 300
(三) 人的发展现状之二:社会认知的偏颇之处	/ 309
二、文化依归:人的发展之尺度	/ 323
(一) 尺度:考量事物发展的依据	/ 324
(二) 文化:人的发展之价值尺度	/ 329

结语 文化才是万物的尺度 / 339

主要参考文献 / 346

后 记 / 360



导 论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钱穆^①

一、研究背景：从现代性文化 困惑到教育的悖论

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已是有关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共识。社会通常按照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控制程度这一标准被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种形态，如马克思所言：“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② 毋庸置疑，社会形态决定着教育的样式，现代

① 钱穆著：《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版，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社会是现代教育的基础。现代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与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诸要素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格局来看，我国当前社会在时间轴上已与西方发达国家一道跨入了现代社会。但现代社会的“现代”一词，其语义内涵并不只包括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划分中的时间概念分割，其语义核心更体现在经“现代化”后而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①至于“现代性”，利奥塔认为：“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之上。”^②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现代化”，即指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明向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化的现代文明的转进过程。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层面的工业化进程虽说是现代化的基础，但工业文明的生长却需要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环境乃至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因素的相应配合。亦即，“社会转型的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技术。只有从文化层面去接纳，科学与技术才能真正扎下根来。”^③从本质上说，我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现状来看，“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就社会总体的发展水平表征而言，“现代性”特征还不典型。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曾有言，今日中国正经历着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它始于鸦片战争时期，是受西方文明挑战而激发，

① 许纪霖、陈达凯著：《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版，第2页。

② 包亚明主编，谈瀛洲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③ 周昌忠著：《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序第2页。



他预言这次转型可望在 21 世纪 40 年代完成。^①

当前，以现代化性为目标的社会转型正处于历史的关键阶段，但“现代性”内涵极为丰富，其范围广阔并且包括诸多层面，我们只能限制在与论题相关的一定范围内来探讨“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是以科学与技术为主导特征的，这样，所谓“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与技术及其以概念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哲学辩护的文化精神的把握。”^②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文化大国，其繁盛发达的文化不仅创造了自我辉煌的文明，同时辐射到周边相邻国家，如日本、朝鲜等，一度曾是世界文化中心。然而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粉碎了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中心的古典荣耀之美梦，突然间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是世界文化中的强者，而且在强悍而陌生的西方“他者”这面镜子前，中国人才第一次发现自我已在以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现代性文化进程中沦为弱者。在中国无奈承认了西方现代性文化描绘的世界图景后，西方“他者”的规范就成为重建中国文化中心的变革运动中下意识遵守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于是，“现代性，是西方语境中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合理性工程，涉及哈贝马斯所概括的认识—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表现合理性诸方面。在中国语境中，它则有了新的独特含义：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③这种现代性论断或许存在需要商酌的余地，但是，“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滞后的国家，只有接受（程度不同的）西方影响才能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因为

① 转引自周昌忠著：《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序第 1 页。

② 周昌忠著：《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46 页。

③ 谢冕、张颐武著：《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发源地，不仅在时间上走在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前面，更主要的是它已经创立了一种现代化的模式、一套现代性的价值系统。”^①

在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历经几次重心转移，试图重建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如洋务派的技术主导、维新派及革命派的政体主导、五四启蒙派的科学主导等，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洋务派中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面对中国文化中心的失落，经过反思后认为落后原因在于技术，因而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过“变器不变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国文化原有的根本价值规范是不变的。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后，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以“道可变”、“道各不同”取代了“变器不变道”，谭嗣同则提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的疑问。维新派在道器与体用一致的思路上提出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改良方案。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提出要以民主政体为核心来重振中国。但这两种政体的范式都是来自西方“他者”的样本，这种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情形的一厢情愿的主观设想，其结果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等认识到，只有科学才能驱除愚昧或蒙昧，只有“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才能使中国重新走上强国之道。^② 但在这种激进的几近全盘西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被切断了。正如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完全离开文化传统基础的彻底变革，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德国 1919 年所颁

① 陶东风著：《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3～214 页。

② 参见：陈景磐著：《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5～146 页；20 世纪中国文化史（重要报刊光盘资料库），<http://lib.ccnu.edu.cn/zw.htm> 2006.4.9。



行的魏玛宪法正是因为脱离了德国文化背景最后竟导致希特勒的崛起，酿成大祸。^①五四运动之后的军阀混战及社会乱世局面也是如此情形。其后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及积重难返的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使中国离世界文化中心的重建目标越来越远，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也是越走越窄，与西方现代性发达国家的落差也越来越大。

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踟躇不前的僵局才被打破。国门在关闭了几十年蓦然向外打开后，国人对西方及相邻一些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大为震惊。相比原来，不仅重建世界中心的梦想越来越不现实，就现代性而言，与他国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固然众多，但文化可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有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可区别为两大主要形态：一是文化取向型；二是宗教取向型”，“中国的历史传统具有若干重大的特征，其中尤以高度的文化取向为其显而易见的特质。”“因为中国传统中具有强烈的文化取向的性格，所以国史所见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之变动，莫不与文化变迁有深刻关系。前者既是后者之因，亦是后者之果，因果相逐，成为国史演进中极堪注意之历史现象。”“可以说，文化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关键性问题。国史之演进转折皆与文化之保存、创造及其转化有关，而中国人亦在文化之保存、创造及转化之中安顿其身心，觅其安身立命之道。”^②因此，在历经了诸如技术主导、政体主导及科学主导等种种现代化尝试失败后，人们发现文化是上述种种主导的主导，是最根本的主导，从而把关注点转移到对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史乃至整个五千年中国史的全面而深刻的文化反省上。中国这个历史上的文化

^①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余英时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版，第429页。

^② 黄俊杰：“文化建设的方向”，苏默、陈杰翔编：《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6。



大国所遭遇的现代性困惑也引起西方学者的思考，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 ~ 1991）曾指出：“1868年至1912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起初西方对中日两国都只产生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①近代思想家严复“考察各国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大的秘密在于它的思想。严复在他的翻译和评论中，通过褒扬、推崇西方的逻辑、法律和科学进化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古圣先贤的精神桎梏。”^②“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③

文化，作为影响到技术、经济、政体、科学及社会行为的基本的元话语或元模式，被视为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中的关键。西方文化因其求新求异的元话语而被确认为中心文化或优等文化，中国文化则因其超稳定结构的特征被认为是边缘文化或劣等文化。不难看出，“现代化”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其实就是“西方化”。尽管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上看，‘现代化’一词是用以代替

① [美] 费正清、赖肖尔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349页。

② [美] 费正清、赖肖尔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页。

③ [美] 费正清、赖肖尔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页。



‘西方化’（‘西化’）的，因为人们承认现代化过程的普遍意义”^①，并认为，“现代性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理念架构。多重现代性的概念，是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论断：传统作为在界定现代化过程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是持续存在的；非西方文明涉及现代西方的自我认识；地区的知识具有全球性意义。”^②即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多重现代性的可能，各国传统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也应有其价值；但是，在长时间的经济落后及文化中心失落后，目前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以文化为主导，就意味着中国在变革自我时实际上陷入一种“他者化”境遇，即以西方“他者”的元话语作为范式，完全以西方的道路为中国现代化之路或重返文化中心之路。

一言以蔽之，我国社会转型的现代性困惑中的思想、精神、观念等莫如说就是文化的困惑。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比较过加纳和韩国最近30年的发展情形，他分析了这两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快慢相差十分悬殊的种种原因，最后得出结论：“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③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其差别原因并解释它们的经济、政治等发展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文化研究热潮中，人们对文化

① 杜维明：“多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② 杜维明：“多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页。



在社会诸层面的改革发展中的先行者地位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如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高级研究员劳伦斯·哈里森提到过著名秘鲁作家略萨的言论，略萨断言，拉丁美洲现代化所需要的经济、教育和司法改革是实现不了的，“除非在这些改革之前或与它们同时，也改革我们的习俗和观念，我们整套的习惯、知识、形象和仪式，即我们所说的‘文化’。……我们有民主的政府，但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性的反应和我们的心态却远不是民主的。”^①类似研究和结论，可以说已不乏见。

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的，加快现代化进程、迅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当前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应运而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②在这种发展洪流中，教育因其所具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而被赋予了众多神圣的使命。教育就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可以脱贫致富乃至教育可以改变一切等观念已然成为社会共识。

但令人遗憾的是，“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它贯穿一切领域。例如，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超级意识形态’，……这就是蒙在

^① [美] 劳伦斯·哈里森：“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美]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② 资料来源于：“科教兴国战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11/04/content_1158167.htm 2006.4.12。